陈喜，王海涛. 选贤任能：村干部治理能力与农村家庭创业［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2）：106-118.
CHEN Xi，WANG Haitao.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village cadres and rural family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6，25（2）：106-118.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6.02.010

选贤任能：村干部治理能力与农村家庭创业

陈喜[1]，王海涛[2]
（1.江苏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江苏 镇江 212100；2.合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摘 要：探讨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为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经验证据。运用CLDS数据库，以村主任的教育个体特征和履历个体特征分别作为知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代理指标，实证探讨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村主任治理能力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创业概率，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从创业动机看，村主任治理能力对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对生存型创业贡献更大；从创业雇工情况看，村主任治理能力能够显著地提升农村家庭的自雇型创业，且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雇主型创业，但对雇主型创业而言，村主任学历和企业管理经历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任职年限的正向作用不显著。此外，村主任治理能力可通过促进村庄非农产业发展、村庄公共品供给和村庄农地转出的作用路径提升农村家庭创业概率。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重视村干部经济治理能力，完善村干部选拔培育机制，有助于加快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村干部；村主任；治理能力；乡村治理；家庭创业
中图分类号：C939；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6）02-0106-13

一、研究背景

“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工作重心。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首要任务是“产业兴旺”，“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并在2021年4月29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①，明确强调农民创新创业对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事实上，农民创业是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内生性增长动力[1]，是农民增收、带动就业的重要力量[2]，有助于促进农村多产业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3]。但不容忽视的是农民持续创业意愿弱[4]、创业失败率高[5]等问题依然存在，深受社会各界关注。

既往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关系网络是农户进行创业决策的关键[6-7]。费孝通指出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圈层差序”人际关系，直接影响个人信用积累和约束力形成[8]。不过这种累积的信用和形成的约束力有助于弥补创业农户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匮乏的情况下，通过社会资本获取创业资源[9]。人际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来源，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有利于创业者识别机会、获取资金、信息等资源，从而促进创业[10]。因此，如何撬动内嵌于农村社会中的“圈子”和“关系”，对促进农村家庭创业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农村居民缺乏流动性是其重要特质[11]。这导致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主的传统社会网络依然相对稳定。村干部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参与者，是乡村治理的典型代表，其个人能力直接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

① 中国中央政府网站.(2021-04-30)[2025-08-12] http://www.gov.cn/xinwen/2021-04/30/content_5604050.htm

收稿日期：2025-09-19 **修回日期：**2025-11-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的效果评价、农户响应机制与优化策略研究”（72403104）；江苏科技大学青年科技创新项目“村庄和谐治理、政策干预与农户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行为”（1192942303）
作者简介：陈喜，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

增收[12-13]。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以往学者更多关注宗族网络和商业关系网络对农户创业影响，有关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户创业方面研究较为罕见。在乡村治理中，作为村域社会网络中的重要管理者和参与者，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是否存在影响，其影响方向如何？如果存在影响，对哪类家庭创业产生影响最大？其作用机制及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保障机制和作用条件又如何？

本研究重点关注村主任个体特征（主要是学历和工作履历）决定的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主要原因为：一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①。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总抓手。而乡村治理有效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根本保障。2019年6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②，更是彰显中国政府对乡村治理的重视。二是农村家庭创业的重要性。据统计中国当前在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达3100万，而农民创业者在创业总人口中的占比也超过71.5%[5]，已成为大众创业中重要群体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三是村主任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各种规划、政策等实施效果离不开各级党政干部的个体能力和个体作用[14]。对乡村治理而言，村干部是政府在农村工作的基础，是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主导者和治理现代化的践行者，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力量。在中国乡村治理中，村干部主要是村主任和村支书，因管理职能分工不同，村主任更多负责村庄经济发展，村支书更多承担政治教育、文化宣传等工作[15]。农户创业活动属于经济行为，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村主任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

不同于既往研究，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双创政策”背景下，从村主任治理能力视角切入，不仅探讨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还厘清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的作用机制。第二，首次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近三期数据，构建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村干部治理能力对不同农村家庭创业类型的影响，因而研究结论更加有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第三，丰富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研究内容，为加强村主任选拔培育机制建设，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直接影响

村主任是基层村干部的典型代表，既是政府代理人又是村民当家人[16]，肩负着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动，更重要的是发挥基层村干部的主观能动性。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在乡村治理中，村主任的主动作用不容忽视，其核心在于个体人力资本存量[13]。从企业管理经验看，拥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干部，因懂管理、能管理和会管理，不仅可以自己投资带领村民创业，也可以为村民提供创业服务[17]，如政策咨询、场地协调等等。从学历角度看，高学历村干部一般具有较强的信息搜集和资源整合能力，更容易为本村落招商引资。不过对于外部私人投资而言，投资风险和资本水平直接影响外出农民返乡创业的积极性[18]。另外，村干部受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视农村公共品供给[19]。而公共投资的完善，可有效降低生产与销售方面的成本，有助于吸引私人投资进入农村创办企业[20]，继而带动农户在关联产业中创业。从干部任职年限看，村干部任职时间越长，个人积累的人脉资源和管理知识储备越丰富，对村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配置能力越强[21]，从而有助于推动农村创业。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1：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①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06-26)[2025-08-12] http://politics.rmlt.com.cn/2014/0626/284245.shtml.

② 中国中央政府网站.(2019-06-23)[2025-08-12].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3/content_5402625.htm.

（二）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之源，是实现乡村振兴重要目标之一。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最主要是推进农村非农产业（第二三产业）发展。村干部作为农村经济组织的带头人，其人力资本水平直接关乎乡村经济发展质量，对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在苏南村庄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同样的区位、政策和市场条件下，个别村庄成长为工业发达村庄，其关键因素是村干部能力强[22]。在农村许多地方，村干部也是经济能人，不仅可以直接兴办种养、加工等家庭企业，也可以与外部资本合作，从事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23]，从而带动农村家庭创业。胡宪洋和保继刚研究发现在蒋巷村乡村旅游发展中村干部主要负责规划和实施，不仅成立村级集团企业，还不断吸引外部企业驻村以及扶持发展村内个体私营企业，带动村民二三产业就业创业[24]。此外，村干部能力对村庄获取外部资源发挥至关重要作用。在工商资本下乡背景下，村干部吸引外部企业进村，较多从事农产品加工或农业观光旅游等高附加值的经营活动[25]，从而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事实上，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可以提高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实现家庭资本积累，为开展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由于村干部发展村庄经营能在一定程度上盘活村庄经济而备受乡镇基层政权的支持[23]。与此同时，村干部因政治晋升受限，发展村庄经营不仅可提高其经济收入，也可以解决农民就业和创业问题，从而获得良好政绩和声望，为其连任提供可能，故动力十足。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2：村庄非农产业发展在村干部治理能力与农村家庭创业之间起到中介传导作用。

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和创业环境因素，而环境因素的作用较大[26]。创业环境理论认为，地方公共品供给是创业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提升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优化创业环境，有助于激发和保护地区创业活力[27]。从生产型公共品看，比如交通，村庄交通便利性越好，农村家庭创业概率越高[28]。与城市相比，农村一般地处偏远，相对封闭，村庄交通的改善可以缩短村庄与外界的物理距离，加速知识、信息、理念等方面的互动与交换，助推农村家庭创业。从生活型公共品看，教育和培训、信息化建设等非生产性公共品是创业支持系统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在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发展，更是突破物理距离，扩大村庄与外界的联动。据统计，半数以上的“双创”主体皆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3]。基于“互联网＋”平台，在农村地区出现“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现象[29]，比如江苏沙集家具“淘宝村”、江苏沭阳花木“淘宝村”、山东曹县演出服饰“淘宝村”等等。尤其是近年来农产品直播电商更是日益兴盛，截至2022年底，全国农村网商（店）已达到1730.3万家，吸引大批农民工、大学生及退伍军人返乡创业①。总之，基础设施的完善加速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农村电商企业成功的关键[30]。有研究表明村干部受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视农村公共品供给[19]。从企业管理经历看，村干部的创业经历或从商经验能够通过带动内外部公共投资推动农村家庭创业[17]。从任职年限看，村干部任职年限越长，对村庄公共品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1]。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3：村庄公共品供给在村干部治理能力与农村家庭创业之间起到中介传导作用。

基于交易成本视角，在农地流转市场中，依托第三方权威介入降低交易成本已获得普遍认可[32]。“双重角色”理论认为村干部既是国家代理人又是村庄当家人，是村庄正式权威。因此，村干部在农地流转中不仅扮演流转中介角色，还是流转双方的代理人，受到正式权力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俘获，私人属性日益凸显[23]。有研究表明，村委会的组织和协调是土地能否实现连片流转的关键[33]。此外，作为村庄“领头羊”，村干部在农地流转市场中还具有示范效应，直接影响村民农地流转行为[34]。从村庄层面看，在不考虑村庄合并或搬迁情况下，自然村落的土地资源禀赋总量存在上限，土地转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鼓励支持工商资本下乡，村庄农地转出的概率更大。由于村庄农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包到户，村庄农地转出，则会导致农户少地或失地。实际上，土地

①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8/content_6899202.htm.

是农民赖以生存之根本，村庄农地转出势必影响农户生计选择，比如创业行为。已有研究证实，农地转出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和减少农业工作投入而激励农民非农创业[35]。苏岚岚和孔荣也发现农地流转会影响农户创业行业的选择[36]。产权经济学理论认为，农地产权的结构和交易可提升农业规模经济和分工效率，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育[37]，拓宽农民创业渠道。总之，农地转出不仅可获取租金，用于满足用于非农领域创业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减少农户对土地的依赖和羁绊，可全身心投入创业。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4：村庄农地转出在村干部治理能力与农村家庭创业之间起到中介传导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绘出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的理论机制示意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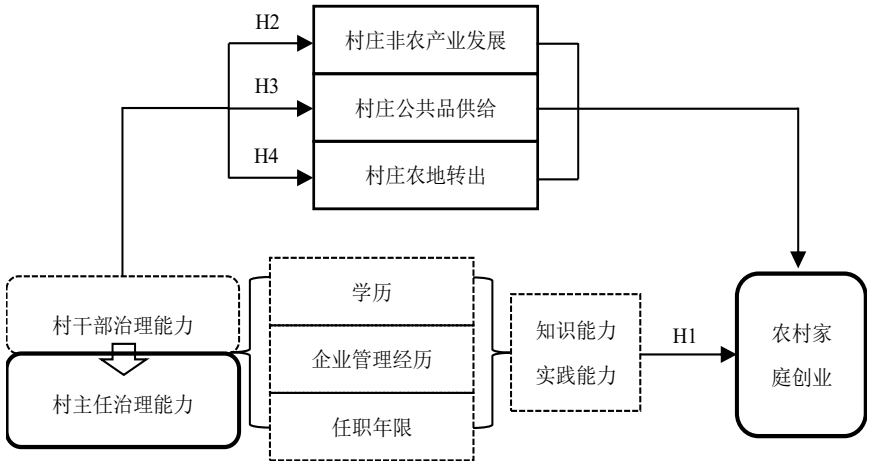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机制图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该调查范围覆盖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西藏、海南除外），建立劳动力（15至64岁）、家庭和社区3个层次的追踪数据库。根据研究需要，使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轮数据并对样本做如下处理：（1）删除城镇样本，仅保留社区为村居的样本；（2）对部分关键变量存在严重缺失值的样本进行剔除；（3）对部分数据进行简单运算和正态化处理；（4）对劳动力、家庭、村居问卷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合并。最终获得由358个村居、12 336户家庭和26 337个劳动力组成的37 677份总样本的三期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模型构建

首先，构建基准模型。为了检验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考虑到创业选择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故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Pr\left(Entre_{it}=1|X\right)=\phi\left(\alpha_0+\alpha_1 Edu_{it}+\alpha_2 Exper_{it}+\alpha_3 Time_{it}+\alpha_4 X_{it}+\delta_i+\vartheta_t+\mu_{it}\right) \quad (1)$$

（1）式中，$Entre_{it}$为i省t年受访者是否创业，Edu_{it}表示村主任学历，$Exper_{it}$表示村主任企业管理经历，$Time_{it}$表示村主任任职年限，是连续变量，本研究将任职年限不满一年的赋值为1，X_{it}为控制变量，包括村主任特征、村庄特征、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δ_i和ϑ_t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μ_{it}为随机扰动项，α为模型待估参数。

其次，传导机制模型构建。为了探讨村主任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内在作用机制，构建以下检验模型：

$$M=\beta_0+\beta_1 Edu_{it}+\beta_2 Exper_{it}+\beta_3 Time_{it}+\beta_4 X_{it}+\mu_{it} \quad (2)$$

$$Entre_{it}=\alpha_0+\alpha_1 M_{it}+\alpha_2 X_{it}+\mu_{it} \quad (3)$$

（2）（3）式中，M分别表示村庄非农产业发展

（*Cnai*）、村庄公共品供给（*Cpg*）和村庄农地转出（*Clo*）。其他变量与上述变量一致。

（三）变量选取

1. 因变量：家庭创业（*Entre*）

借鉴王琼和黄维乔的研究，认为农民创业是农民借助家庭单位或创建新的单位，通过投入或整合各项资源，在农业或其他行业从事新的生产经营活动以持续生计并谋求发展的过程[38]。由此可见，农民创业很大程度依赖家庭资源，因此本文将农民创业视为农村家庭创业。对创业的衡量主要依据受访者调查时点的工作状况，借鉴已有研究[38-39]，基于CLDS劳动力问卷中关于劳动者职业类型的调查，将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自由工作者①除外）定义为家庭创业。若“家庭成员有1人及以上是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则将农村家庭创业赋值为1，反之为0。

2. 核心解释变量：村干部治理能力

借鉴已有研究[13-15]，本研究使用村主任的教育个体特征和履历个体特征分别作为知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代理指标。村主任拥有较高学历则表明村主任在与村落管理相关的知识上占有优势[13]。因此，借鉴文雁兵等的研究经验[14]，村主任知识能力用村主任学历（*Edu*）表征。如果村主任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则赋值为1，反之为0[13]。借鉴赵仁杰和何爱平[15]、杨婵和贺小刚的研究[13]，实践能力分别用企业（工厂）管理经历（*Exper*）和任职年限（*Time*）表征。如果村主任具有企业管理经历则赋值为1，反之为0；村主任任职年限为连续变量，用具体数值表示。

3. 中介变量：村庄非农产业发展（*Cnai*）、村庄公共品供给（*Cpg*）和村庄农地转出（*Clo*）

其中，村庄非农产业依据CLDS村级问卷中“去年，本村有没有非农业经济（第二三产业）?”进行判别，如果回答“有”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村庄公共品供给，用供给数量表征。借鉴贾鹏等研究做法[40]，将农村公共品供给分为生产型和生活型两种，生产型公共品具体衡量方法不变，生活型公共品除此之外，还将本村有没有幼儿园、儿童游乐场、通电、电视、电话、娱乐场所、卫生室/站和健身设施纳入数量统计，最终将生产型和生活型公共品数量相加获得村庄公共品供给总数。村庄农地转出，通过“本村土地是否被政府或企业征用或租用过?”进行判别，如果有则认定为农地转出，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4. 控制变量

选取村主任的年龄（*Age*）、户籍地（*Hjd*）、性别（*Csex*）、政治面貌（*Pos*）、第一大姓（*Fdx*）反映村主任的其他特征；选取村庄是否有银行（*Cbank*）、村庄到乡政府距离（*Cdis*）、村庄自然资本（*Cnac*）反映村庄特征；选取户主的性别（*Hsex*）、婚姻（*Hmarr*）、教育程度（*Hedu*）反映户主特征；选取家庭平均健康（*Fah*）、家庭平均教育程度（*Fedu*）、家中是否有汽车（*Fcar*）、家庭平均耕地（*Fal*）、是否借贷（*Flb*）、家庭总收入（*Ftr*）和家庭总支出（*Fte*）反映家庭特征。上述各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首先，考虑到影响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需进行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在1.03～1.31之间，均值为1.13，证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为消除残差的异方差和自相关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本研究所有回归均以家庭层面作为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最后，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质量，在回归中加入村主任其他特征、村庄特征、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并且对年份和省份也进行控制。

表2是采用Probit模型估计的基准回归结果。表中M1和M3分别报告以村主任治理能力作为核心变量的模型回归系数；M2和M4分别报告平均边际效应。M1和M2在不考虑任何控制变量条件下，村主任学历、企业管理经历和任职年限的估计系数全部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中M3

① 自由工作包括自由职业以及零散工、摊贩、无派遣单位的保姆、自营运司机、手工工匠等。虽然有些文献将其列入创业范畴，但在国内，这类工作都属于比较零散的工作，工作变化较大，经营规模也难以扩大，与创业的内涵存在差异，故将其列入非创业活动[35]。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家庭创业	0.0539	0.2257	0	1
核心解释变量	村主任学历	0.0270	0.1621	0	1
	村主任企业管理经历	0.3314	0.4707	0	1
	村主任任职年限	7.9912	5.5463	1	34
中介变量	村庄非农产业发展	0.2873	0.4525	0	1
	村庄公共品供给	11.8374	4.3312	1	24
	村庄农地转出	0.4164	0.4930	0	1
村主任其他特征	村主任年龄	48.8763	8.4206	22	70
	村主任户籍地	0.9870	0.1131	0	1
	村主任性别	0.9708	0.1685	0	1
	村主任政治面貌	0.8000	0.4000	0	1
	村主任第一大姓	0.3988	0.4897	0	1
村庄特征	村里是否有银行	0.15851	0.3652	0	1
	到乡政府距离	5.6419	5.8071	0	50
	村庄自然资本①	6.9982	8.9488	0	114.21
户主特征	性别	0.9233	0.2662	0	1
	婚姻	0.9283	0.2580	0	1
	教育程度②	3.9442	2.9440	0	16
家庭特征	家庭平均健康	3.8269	0.7521	0.125	5
	家庭平均教育程度	7.2907	2.5377	0	19
	是否有汽车	0.1363	0.3431	0	1
	家庭平均耕地	1.6907	4.1486	0	250
	是否借贷	0.3687	0.4825	0	1
	家庭总收入	10.0919	1.5470	0	15.4737
	家庭总消费	10.1205	1.0267	0	15.1816

注：①人均生物生产面积=村庄生物生产面积/村庄户籍人口数，借鉴赵雪雁等研究做法[41]，生物生产面积计算公式如下：耕地面积×2.8+牧草面积×0.5+林地面积×1.1+鱼塘×0.2+林果面积×1.1（亩）。②借鉴仇焕广等研究做法[42]，采用受教育年限表征

和M4报告考虑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根据M4结果可知，村主任学历、企业管理经历和任职年限皆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从边际效应比较看，村主任学历＞村主任企业管理经历＞村主任任职年限。可见，村主任治理能力与农村家庭创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村主任治理能力越强，该地区农村家庭发生创业行为概率越高。H1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1. Logit模型和Cloglog模型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采用Probit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是否稳健，故分别采用Logit模型和Cloglog模型对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详见表3。囿于篇幅，该部分仅仅汇报了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控制变量部分尚未展示。结果表明，不管从回归系数看还是从边际效应看，村主任学历、企业管理经历和任职年限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且皆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可见，采用Probit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2.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在村主任治理能力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创业行为表现出的差异可能不仅源于村主任治理能力的影响，还可能源于一些客观存在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如农户风险偏好、创业认知能力和机会识别能力等方面差异，若忽视这些因素将可能导致参数估计存在偏误。因此，借鉴Rosenbaum和Rubin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消除上述混杂因素所致偏差[43]，其基本思想是基于反事实的估计方法。为尽可能保证处理组和控制组具有同质性，本部分根据村主任任职年限的中位

表2 基准模型回归模型

变量名称	M1	M2	M3	M4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村主任学历（*Edu*）	0.445***	0.0479***	0.315***	0.0306***
	（0.0577）	（0.0063）	（0.0753）	（0.0073）
村主任企业管理经历（*Exper*）	0.277***	0.0299***	0.130***	0.0126***
	（0.0292）	（0.0032）	（0.0320）	（0.0031）
村主任任职年限（*Time*）	0.0121***	0.0013***	0.0072***	0.0007***
	（0.0021）	（0.0002）	（0.0026）	（0.0003）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年份控制	否	否	是	是
省份控制	否	否	是	是
对数似然函数值	-7768.5139	-7768.5139	-6875.6609	-6875.6609
Pseudo R^2	0.0168	0.0168	0.1242	0.1242
样本量	37677	37677	37441	3744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Ⅰ

变量名称	M1	M2	M3	M4
	Logit模型	Logit模型	Cloglog模型	Cloglog模型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村主任学历（*Edu*）	0.535***	0.0254***	0.454***	0.0228***
	（0.152）	（0.0072）	（0.137）	（0.0069）
村主任企业管理经历（*Exper*）	0.274***	0.0130***	0.260***	0.0131***
	（0.0665）	（0.0032）	（0.0629）	（0.0032）
村主任任职年限（*Time*）	0.0141***	0.0007***	0.0130**	0.0007**
	（0.0054）	（0.0003）	（0.0051）	（0.0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省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对数似然函数值	−6865.3988	−6865.3988	−6868.3121	−6868.3121
Pseudo R^2	0.1255	0.1255	—	—
样本量	37441	37441	37441	37441

数，将其划分为长任职年限和短任职年限。然后，分别使用K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根据表4可知，尽管三种匹配方法所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所得结论与前文估计基本一致，即村主任学历、企业管理经历和任职年限有助于农村家庭创业。这说明在考虑到配对偏差的情况下，村主任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依然成立。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Ⅱ

变量名称	M1	M2	M3
	K近临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村主任学历（*Edu*）	0.0346**	0.0371***	0.0357**
	（0.0149）	（0.0126）	（0.0121）
村主任企业管理经历（*Exper*）	0.0197***	0.0184***	0.0197***
	（0.0034）	（0.0028）	（0.0028）
村主任任职年限（*Time*）	0.0089***	0.0130***	0.0131***
	（0.0030）	（0.0025）	（0.0025）

3. 缩尾检验

考虑到村主任作为乡村治理的精英代表，治理成效存在滞后性，任期较短的村主任对村庄各方面贡献在短期内难以显现。因此，本研究分别在1%、5%和10%上做双侧缩尾处理，并删除

两端样本，再使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缩尾检验的估计结果（见表5）显示，与表2的估计结果相比，村主任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在显著性水平上没有变化，在边际效应方面变化较小，说明本文使用Probit模型考察村主任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Ⅲ

变量名称	M1	M2	M3	M4	M5	M6
	1%双侧缩尾		5%双侧缩尾		10%双侧缩尾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村主任学历	0.322***	0.0313***	0.350***	0.0343***	0.264***	0.0271***
（*Edu*）	（0.0759）	（0.0074）	（0.0774）	（0.0076）	（0.0833）	（0.0086）
村主任企业管理经历（*Exper*）	0.134***	0.013***	0.130***	0.0127***	0.123***	0.0127***
	（0.0324）	（0.0032）	（0.0329）	（0.0032）	（0.0343）	（0.0035）
村主任任职年限	0.0107***	0.001***	0.0180***	0.0018***	0.0176***	0.0018***
（*Time*）	（0.0030）	（0.0003）	（0.0036）	（0.0004）	（0.0042）	（0.0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对数似然函数值	−6811.6344	−6811.6344	−6498.866	−6498.866	−5984.5534	−5984.5534
Pseudo R^2	0.1256	0.1256	0.1284	0.1284	0.1256	0.1256
样本量	37077	37077	35139	35139	30946	30946

（三）创业异质性分析

1. 创业动机异质性分析

全球创业观察（GEM）根据动机将创业划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是迫于生计或者对现状不满而被动创业，机会型创业因商业机会驱动，主动性更强，不仅限于物质财富的回报，更多是为了追求独立、自我实现等[44]。借此，本研究参考全球创业观察（GEM）的标准，结合CLDS问卷中“你当初是因为抓住好的机会选择创业”来判别创业者是机会型创业还是生存型创业[39]。具体估计结果详见表6。在表6中，M1和M3报告了回归系数，M2和M4报告边际效应。根据M2和M4可知，从显著性看，村主任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的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都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从边际效应看，村主任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生存型创业的边际效应要略大于机会型创业，原因是相对于机会型创业家庭而言，生存型创业家庭资源禀赋较差，面临着严重的生计问题，没有更好的生计选择方案，创业可能是其唯一经济来源渠道，更加青睐于从身边获得经营有关的信息，而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紧密联系村民，可提供更多有关创业方面的咨询、信息服务和创业基础设施服务，为其创业活动提供良好环境。

2. 创业雇工异质性分析

在CLDS的调查中，严格地区分调查者是雇主、自雇还是雇员，并进行分模块调查。按照创业活动是否雇佣员为标准划分，创业活动可以分为雇主型创业（雇佣员工的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和自雇型创业（无雇员的个体工商户）。毋庸置疑，雇主是一种重要的创业行为，而自我雇佣是创业的最初形态，在现有文献中也被视为创业的重要形式之一[45]。理论上而言，雇主型创业一般规模较大，资金门槛高，而自雇型创业相反。据表7中的M2和M4可知，在自雇型创业下的村主任学历、企业管理经历和任职年限边际效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自雇型创业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在雇主型创业下的村主任学历边际效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企业管理经历边际效应在10%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任职年限边际效应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雇主型创业受村主任学历和企业管理经历影响较大，与村主任任职年限无关，原因是雇主型创业规模较大，资金门槛高，创业者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创业目标性很强，与村主任任职年限长短关系不大。从边际效应大小看，村主任治理能力对自雇型创业的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雇主型创业，原因是相对于

表6 不同创业动机分析

变量名称	M1	M2	M3	M4
	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村主任学历（*Edu*）	0.234***	0.0169***	0.294***	0.0114***
	（0.0851）	（0.0062）	（0.0951）	（0.0037）
村主任企业管理经历（*Exper*）	0.0979***	0.0071***	0.145***	0.0057***
	（0.0341）	（0.0025）	（0.0436）	（0.0017）
村主任任职年限（*Time*）	0.0063**	0.0005**	0.0065*	0.0003*
	（0.0028）	（0.0002）	（0.0038）	（0.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省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对数似然函数值	−5244.4174	−5244.4174	−2872.669	−2872.669
Pseudo R^2	0.0835	0.0835	0.1676	0.1676
样本量	37441	37441	37441	37441

雇主型创业而言，自雇型创业在规模、资金、人脉等方面门槛较低，属于创业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村主任作为乡村治理重要主体，其治理能力越高，为村民提供的创业环境越好，越能平衡各群体间就业机会。

表7 不同创业雇工情况分析

变量名称	M1	M2	M3	M4
	自雇型创业		雇主型创业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村主任学历（*Edu*）	0.239***	0.0208***	0.391***	0.0080***
	（0.0811）	（0.0071）	（0.121）	（0.0025）
村主任企业管理经历（*Exper*）	0.121***	0.0105***	0.105*	0.0021*
	（0.0332）	（0.0029）	（0.0633）	（0.0013）
村主任任职年限（*Time*）	0.0066**	0.0006**	0.0080	0.0002
	（0.0027）	（0.0002）	（0.0056）	（0.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省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对数似然函数值	−6217.5079	−6217.5079	−1446.2769	−1446.2769
Pseudo R^2	0.1028	0.1028	0.1892	0.1892
样本量	37441	37441	35050	35050

五、中介机制分析

（一）村庄非农产业发展

无论是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还是乡村和谐发展，都要求以农村经济建设为中心[13]。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把产业兴旺作为首要任务，鼓励和支持农村积极发展第二三产业（非农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村主任作为乡村治理中重要领导者，对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尤为重要[15]。据表8中M1可知，村主任学历和企业管理经历对村庄非农产业发展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村主任学历越高，拥有企业管理经历，村庄非农产业发展越好，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村主任肩负着发展农村经济的职责息息相关；村主任任职年限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村主任任职年限越长，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越受限，原因是：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村主任任职初期会利用内外部资源发展村落经济，但随着任期延长，村主任本人更加依赖内部资源且逐渐安于现状，更多把重心放在村落非经济事务上，则会弱化其对外部环境反应能力，导致村落经济发展不景气[13]。据M2可知，村庄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户家庭创业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可见，村主任治理能力可通过村庄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农户家庭创业。H2得到验证。

（二）村庄公共品供给

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村庄公共品供给对于农户创业者来说即为“器”。创业环境理论认为，地方公共品供给是创业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创业者至关重要。据表8中M3可知，村主任学历和企业管理经历对村庄公共品供给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村主任学历越高，拥有企业管理经历，村庄公共品供给越多，即村主任公共设施越完善；村主任任职年限对村庄公共品供给影响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原因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更多是国家战略安排，存在先后发展次序，需要通过上级部门综合考察和评估之后才能做出同意和拨款决定，村主任任期越长，与上级沟通越畅，出于人际关系网络，获取上级批示本村基础设施建设概率较大，但不能左右国家战略性投资顺序，故很难达到建设预期。据M4可知，村庄公共品供给对农户家庭创业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可见，村主任治理能力可通过增加村庄公共品供给促进农户家庭创业。H3得到验证。

（三）促进农地转出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村庄土地被征用或租用给政府或企业，导致农民少地或失地，为了生计村民不得不调整原有生计策略。据表8中M5可知，村主任学历、企业管理经历和任职年限对农地转出至少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可见村主任治理能力有助于促进村庄农地转出。据M6可知，农地转出对农户家庭创业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农地转出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由此可见，村主任治理能力可通过促进农地转出提高农户家庭创业概率。H4得到验证。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村庄精英群体，村主任是乡村治理体系中村干部的典型代表。因此，本研究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以村主任治理能力为代理变量，考察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村主任治理能力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创业概率，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从创业动机看，村主任治理能力对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对生存型创业贡献更大；从创业雇工情况看，村主任治理能力能够显著地提升农村家庭的自雇型创业，且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雇主型创业，但对雇主型创业而言，村主任学历和企业管理经历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任职年限的正向作用不显著。（3）村主任治理能力可以通过促进村庄非农产业发展、村庄公共品供给和农地转出的作用路径提升农村家庭创业概率。

（二）对策建议

1. 完善村干部选拔培育机制。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以村主任为代表的村干部在乡村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因此，在选拔任用上，除了考虑年龄、性别和群众基础之外，更要重视村干部的学历、企业管理经验和任职期限，通过政策吸引高学历、懂管理、知农、爱农的优秀人才担任村干部；与此同时，完善村干部培训体系，不断提高村干部治理能力，配合国家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推动农村家庭创业就业，带动乡村产业兴旺。

2.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生产设施和生活设施都是家庭创业环境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改善农村营商环境，激发农村家庭创业行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3. 鼓励支持农村发展非农产业。在工商资本下乡背景下，村干部要抓住国家政策机遇，不仅要加强与外面有实力的投资企业合作，发展乡村非农产业，更重要的是借助外资企业培育本村农民创办企业，嵌入到商业链条中去，形成产业集

表8 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名称	M1	M2	M3	M4	M5	M6
	probit	probit	Fe	probit	probit	probit
	Cnai	*Entre*	*Cpg*	*Entre*	*Clo*	*Entre*
	边际效应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边际效应	边际效应
村主任学历（*Edu*）	0.0559***		0.858***		0.0576***	
	（0.0184）		（0.153）		（0.0147）	
村主任企业管理经历（*Exper*）	0.0267***		0.889***		0.0171***	
	（0.0078）		（0.0653）		（0.0057）	
村主任任职年限（*Time*）	−0.0021***		7.77e-05		0.0008*	
	（0.0007）		（0.0055）		（0.0005）	
村庄非农产业发展（*Cnai*）		0.0140***				
		（0.0030）				
村庄公共品供给（*Cpg*）				0.0021***		
				（0.0004）		
村庄农地转出（*Clo*）						0.0063*
						（0.003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对数似然函数值	−16 853.773	−6898.0585	—	−6891.3756	−12 935.934	−6901.0149
Pseudo R2	0.2260	0.1214	0.4604	0.1218	0.4912	0.1198
样本量	35492	37441	37370	37370	37410	37410

聚效应。

4. 规范村庄农地流转市场秩序。农地转出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家庭创业概率，但是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之根本。在保障农村社会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村干部经营人角色，加强农村农地流转市场信息平台建设，提高信息透明度，弱化村干部私人属性，防止村干部滋生腐败行为，损害农村营商环境。

5. 提供农村家庭创业的良好环境，重点扶持精英家庭创业。在国家“双创”政策和返乡创业政策背景下，村干部要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好在乡返乡创业的农民、大学生和退役军人的服务工作，加大对精英群体在乡返乡创业的扶持力度，如创业场地、金融服务、税收优惠等，使其将在外获得的知识、经验和资金带回家乡，发展乡村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本研究实证探析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但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仍需要在未来研究中拓展分析。第一，囿于数据来源，本研究对农村家庭创业的衡量主要采用二值虚拟变量，为了进一步刻画农村家庭创业，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采用农村家庭成员创业，参与比例进行衡量。第二，本研究选取村主任的教育个体特征和履历个体特征分别作为知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代理指标，虽然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但毕竟不是直接指标而是代理指标，其衡量方式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 考 文 献

[1] 李祎雯，张兵. 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J]. 经济科学，2016（2）：93-105.

[2] 朱红根，康兰媛. 家庭资本禀赋与农民创业绩效实证分析[J]. 商业研究，2016（7）：33-41，56.

[3] 韩长赋. 以农村创业创新推动乡村振兴[J]. 湖南农业，2018（5）：26-27.

[4] 于丽卫，孔荣. 农民农业领域创业脆弱性：关键成因、生成机理与应对策略[J]. 现代经济探讨，2021（2）：113-120.

[5] 刘志阳，刘小童，刘姿含. 抑郁是否影响创业退出——

来自中国农民创业者的微观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2022，25（1）：92-106.
[6] 林建浩，吴冰燕，李仲达. 家庭融资中的有效社会网络：朋友圈还是宗族?[J]. 金融研究，2016（1）：130-144.
[7] 贺小刚，朱丽娜，吕斐斐，贾植涵. 创业者缘何退出:制度环境视角的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9，22（5）：101-116.
[8]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4-30.
[9] Stam W，Arzlanian S，Elfring T. Social cpital of entrepreneurs and small firm performance：a meta-analysis of contextual and methodological moderator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4，29（1）：152-173.
[10] 马光荣，杨恩艳.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 经济研究，2011，46（3）：83-94.
[11] 周立. “城乡中国”时代的资本下乡[J]. 人民论坛，2018（28）：70-72.
[12] 高梦滔，毕岚岚. 村干部知识化与年轻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09（7）：77-84，92.
[13] 杨婵，贺小刚. 村长权威与村落发展——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J]. 管理世界，2019，35（4）：90-108，195-196.
[14] 文雁兵，郭瑞，史晋川. 用贤则理：治理能力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百强县和贫困县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2020，55（3）：18-34.
[15] 赵仁杰，何爱平. 村干部素质、基层民主与农民收入——基于CHIPS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2016（2）：129-152.
[16] 徐勇. 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J]. 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8）：70-72.
[17] 陈建英，王定祥，刘婷婷. 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57-67，192.
[18] 陈波. 风险态度对回乡创业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09（3）：84-91.
[19] 姚升，张士云，蒋和平，等. 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2011（2）：110-116.
[20] Jalan J，Ravallion M. Geography poverty traps? A micro econometric model of consumption growth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2002（17）：329-46.
[21] 徐晓军，林川琪. 返乡能人村庄治理成效差异的演化逻辑——基于S镇返乡能人村干部任职的历时性观察[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55（5）：119-130.
[22] 夏柱智.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点[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2）：22-30.
[23] 蒋永甫，杨祖德，韦赟. 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与角色规范[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15-122.
[24] 胡宪洋，保继刚. 乡村旅游景观特质网络演进的蒋巷村案例[J]. 地理研究，2016，35（8）：1561-1575.
[25] 贺雪峰. 工商资本下乡的隐患分析[J]. 中国乡村发现，2014（3）：125-131.
[26] Badulescu A，Hatos R. Entrepreneurship versus self-employmen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hanges in romania：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factors[R]. Proceedings of the 8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 Entrepren，2013.
[27] 赵佳佳，魏娟，刘天军. 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2023（5）：61-80.
[28] 陈习定，张芳芳，黄庆华，等. 基础设施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18（4）：80-89.
[29] 于海云，汪长玉，赵增耀. 乡村电商创业集聚的动因及机理研究——以江苏沭阳“淘宝村”为例[J]. 经济管理，2018，40（12）：39-54.
[30] Jennex M E，Amoroso D，Adelakun O. E-commerce infrastructure success factors for small companie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2004（3）：263-286.
[31] 周密，康壮. 村级公共产品筹资方式异质性：基于村干部人格特征的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2019（2）：78-92.
[32] 马贤磊，仇童伟，钱忠好. 农地流转中的政府作用：裁判员抑或运动员——基于苏、鄂、桂、黑四省(区)农户农地流转满意度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家，2016（11）：83-89.
[33] 贺利云. 一个种粮大户对土地流转的困惑与期盼——来自湖南省祁阳县的典型调查[J]. 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3）：94-96.
[34] 洪名勇，何玉凤. 论“领头羊”在农户农地流转中的带动作用[J]. 江西社会科学，2020，40（6）：216-224，256.
[35] 田勇. 激励还是抑制？——土地权益变更与农村家庭创业[J]. 经济科学，2019（5）：117-128.
[36] 苏岚岚，孔荣. 农地流转促进农民创业决策了吗？——基于三省1947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J]. 经济评

论，2020（3）：69-86.
[37] 罗必良，李尚蒲.论农业经营制度变革及拓展方向[J].农业技术经济，2018（1）：4-16.
[38] 王琼，黄维乔.农民创业更幸福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3）：99-110.
[39] 叶文平，李新春，朱沆.地区差距、社会嵌入与异地创业——“过江龙”企业家现象研究[J].管理世界，2018，34（1）：139-156.
[40] 贾鹏，庄晋财，李娟.农村公共品供给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了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37（6）：12-25.
[41] 赵雪雁，刘江华，王伟军，等.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干预——以陇南山区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20，39（6）：982-995.
[42] 仇焕广，苏柳方，张祎彤，等.风险偏好、风险感知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J].中国农村经济，2020（7）：59-79.
[43] Rosenbaum P R，Rubin D B.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 Biometrika，1983，70（1）：41-55.
[44] 杨婵，贺小刚，李征宇.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7（12）：170-188.
[45] 阮荣平，郑风田，刘力.信仰的力量：宗教有利于创业吗?[J].经济研究，2014，49（3）：171-184.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village cadres and rural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CHEN Xi[1]，WANG Haitao[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njiang* 212100，*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village cadres on rural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to adv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modernize rural governance. Taking the village directors as an example，it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village directors on rural househol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by using the CLDS database.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village director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in rural households，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robustness checks. From an entrepreneurial motive，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village directors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urvival-driven entrepreneurship and opportunity-driven entrepreneurship，with agreater contribution to survival-driven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ial employees，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village director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elf-employment of the rural households，and the marginal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mployer entrepreneurial. However，for employer-type entrepreneurship，village directors′ education and corporate management experience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a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years of office is not significant. In addition，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village directors can enhance rural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probability through village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village public goods supply，farmland transfer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emphasizing the economic governance capacity of village cadres a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s for their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will help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Village cadres；Village directors；Governance capacity；Rural governance；Family entrepreneurship